

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政策初探

徐友珍

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政策是法国败降后英国孤军作战的产物。直至苏德战争爆发,欧洲抵抗运动在英国战略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英国率先倡导欧洲抵抗运动并成为支持欧洲抵抗运动最早的国际中心。但该政策一开始就具有相当的保守性和矛盾性。苏美参战动摇了前一时期英国政策的战略基础与核心理论,更增加了其保守色彩。SOE在实践中面临的种种难题也加速了英国政策向保守方向演变。但战争形势的缓解和战时内阁对SOE的改组又为英国政策有效实施提供了可能。随着盟国战略反攻开始,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政策大规模实施与英美战略密切相关;不同的战略需要决定了英国政策的偏重和具体内容的差异,同时反法西斯短期战略需要与英国在特定地区和国家追求的长远政治利益及其矛盾斗争导致其政策复杂多变。欧洲第二战场开辟至德国投降,英国政策渐失其积极内容。

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政策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内容庞杂、极富争议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对这一论题展开论述和评价,只想仅就该政策的正式提出、发展演变及其在某些主要地区和国家的实施情况作些初步探讨。

虽然有关在未来战争中使用非常颠覆手段打击敌人的探讨早在1939年前引起了英国军方的极大注意,并在“奇怪战争”期间开始付诸行动,但严格说来,支持欧洲抵抗运动作为一种正式的官方政策出现则是在法国败降后英国孤军作战的产物。

1940年5月至6月,西欧的迅速沦陷不仅置英国于孤军作战的困境,“也意味着先前辛勤制订的战略的破产”^①。在此之前,英国并未打算在欧洲大陆同德军作战,它认为:“对德战争将主要在海上和空中进行,并通过经济封锁、战略轰炸和由西欧尤其是法国提供的陆上力量来从事与大陆敌人的战争。”^②很显然,战局的急剧发展打乱了英国的战略设想。所以,从5月中旬起,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就不断探讨一旦法国崩溃后英国未来战略问题。但在当时极其困难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特别是其西欧盟国相继瓦解而美苏两强尚中立之时,英国战略并没有

多大更新余地。除经济封锁、战略轰炸之外,鼓动和援助欧洲抵抗运动被赋予了极高的战略价值,成为第三种武器。这种战略设想在5月27日参谋长给战时内阁的备忘录中得到充分体现。该备忘录认为:“打败德国可以通过经济封锁、针对敌国经济目标和士气的持续空袭和在广大被占领土上发动起义的联合行动来实现”^⑧;“导致德国崩溃的其他最佳选择就是在被占领土上激发起义的火种……我们应视这种形式的斗争至关重要。因而当务之急是组建一个特殊的机构,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进行必要的筹备和培训等”^⑨。这一备忘录当日便由战时内阁讨论通过。7月1日,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决定“建立一个拥有绝对权利的专门机构负责颠覆事宜”^⑩。16日,丘吉尔首相召见工党领袖道尔顿并委之以“点燃欧洲火炬”的重任,同时授权枢密院长张伯伦起草有关文件,19日正式文件提出。该文件命名新成立的组织为特别行动执行局(SOE),其使命为“协调以颠覆破坏形式反对海外法西斯敌人的一切行动”,“所有颠覆活动的计划都需得到道尔顿的认可”;“SOE的总体计划须经参谋长们同意,当涉及其他部门利益时,道尔顿需与外交部及相关部门商榷”^⑪。22日,战时内阁正式通过对道尔顿的任命,文件所规定的一些基本内容也得到认可。

但究竟执行什么样的政策,英国战时政府内部意见并不一致,反映在SOE上层领导之间存在明显分歧。关于抵抗运动内涵:道尔顿在7月2日给哈里法克斯的信中曾作如下表述:“我们应在欧洲国家开展类似于爱尔兰的‘新芬运动’、中国抗日战争之类的地下活动,成立类似于威灵顿战役中起过光辉作用的西班牙非正规军、或者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纳粹在世界各地都发展得相当完备的地下组织。我们必须采取各种方式,包括工业和军事破坏、煽动怠工和罢工,持续不断的宣传攻势,惩办内奸,对德国占领者的恐怖行动、禁运和暴动等”^⑫。8月19日,他向参谋长委员会提交的一份“绝密”文件再次提出:“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必须与陆、海、空一样成为一个独立的军种——第四军。这种第四军……简言之,就是以敌国、敌占区的贸易联盟和社会主义者为主要依靠对象,制造爆炸、混乱和革命”^⑬。道尔顿的思想理论遭到了政府部门,特别是SOE内部一些高级官员的反对。在这些人看来,欧洲的抵抗就是依靠象波兰、捷克那样一些组织良好、训练有素的秘密军队,进行抵抗,SOE将致力于鼓励和装备欧洲秘密军队,增强它们的力量并引导其从事对敌人交通、军事目标和士气的颠覆破坏行动,同时要防止过早暴露和起义。一俟盟军反攻,抵抗力量将举行起义,解放他们的国家”^⑭。这种理论在SOE上层颇有市场,并合乎英国政府对欧洲抵抗运动政策的基本理解,很快便被确认为SOE的官方理论及其指导欧洲抵抗运动的基本战略思想^⑮。不难看出,实质上是一种消极待机战略。从其内容上看,该理论存在很大的矛盾性。一方面欧洲抵抗力量的起义被作为未来解放欧洲的主体;另一方面它又限定起义的主体为地下军队,并要求在盟军反攻之前抵抗力量必须约束自己的行动,防止过早暴露和起义。这不仅会大大束缚抵抗运动的发展,使之无法壮大和显示自己的力量,难以保证最后起义的成功,也无法让盟国军事领导人相信其战略价值而予以全力支持,势必动摇其主体地位。

英国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消极保守而又自相矛盾的政策,首先应该说是受制于当时的客观环境。英国在孤军作战、与德意法西斯兵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它所预见的反攻可能是在盟国通过经济封锁、战略轰炸使法西斯力量不断消耗之后,再以小规模英军和自由盟军分遣队在欧洲不同地区登陆为前锋、以英军从空中、海上支援为策应,引发欧战区的武装起义,进而解放欧洲^⑯。而当时英伦三岛孤悬海外,与欧洲大陆近乎隔绝,各种战略物资,尤其飞机、潜艇极为短缺,要在被希特勒严密把守的欧洲大陆内部去策动一场道尔顿所主张的全民抵抗

和起义不仅费时费事，而且前途莫测，而依靠流亡政府及其影响控制下的秘密军队作为消耗敌军和未来解放欧洲的主体则不失为一条现实而便捷的途径。更重要的是，这样做能保全英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是因为，英国进行这场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恢复与其利益相关的战前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稳定而不是剧变^③。在他们看来，一切有关欧洲的重大变化都只能依靠合法政府来完成^④。而大多数流亡政府因害怕公开抵抗会导致敌人的无情报复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从而危及其日后统治地位的恢复。加上 SOE 上层也多来自金融界和商界，“这些人出于偏见也会反对动员欧洲左派和劳动者。”^⑤这些因素从根本上限定了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政策的具体内容。可以说，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政策是英国政府既希望通过支持欧洲抵抗运动达到从内部消耗敌人，并充当反攻欧洲主力的战略目标，又不愿为之付出巨大牺牲，特别是不愿以其长远政治利益去冒险这样一种两难处境的产物。

但总的看来，从西欧沦陷至苏德战争爆发之前，欧洲抵抗运动在英国战略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英国奉行积极支持欧洲抵抗运动的立场。虽然这一时期战争形势十分严峻，英国给欧洲抵抗运动的直接援助十分有限，但英国作为当时唯一坚持抵抗法西斯的大国和伦敦作为各国流亡政府、组织的活动中心，它率先倡导、支持欧洲抵抗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欧洲抵抗运动的兴起，也使英国成为支持欧洲抵抗运动最早的国际中心。不过，只是由于战争环境的险恶和英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保守性，才大大限制了英国政策的积极内容，增加了这一政策本身的矛盾性和实施难度，也使日后的政策演变和矛盾冲突在所难免。

二

1941 年 6 月 22 日苏德战争爆发使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政策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苏联和各国共产党公开投身反法西斯斗争，英国对苏联和欧洲共产党的敌视态度有所改变，以此为契机，SOE 同苏联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开始合作开展反纳粹地下活动；但另一方面，由于苏联这个强大盟友的出现，欧洲抵抗运动在英国战略中渐趋次要地位。加上苏联参战后号召欧占区开展积极抵抗行动，欧洲抵抗运动迅速发展，令英国及各国流亡政府忧虑不安。对欧洲长远政治利益的考虑又得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政策，如苏德战争的爆发，首先使 SOE 的行动计划和指导思想受到冲击。在此之前，道尔顿基于 6 月 14 日英国未来战略考察文件精神，正满怀信心地准备一个更大规模、更广远的欧洲革命计划^⑥。然而他在 7 月 21 日提交给首相的备忘录中^⑦，不仅大大削减了 SOE 5 月份计划的规模，推迟了行动日期，而且特别明显的变化是，考虑到苏联参战后波兰、捷克战略地位的下降及这两个中欧国家极有可能在政治上受到苏联影响^⑧，而放弃了大规模武装这两支当时最有发展潜力的秘密军队作为未来反攻主体的计划，代之以小规模派代表、提供有限的武器援助以协助其从事颠覆破坏活动。在此基础上，8 月 14 日和 15 日，战时内阁两次召集会议，进一步对道尔顿的备忘录进行了处置，认为其中有关鼓励颠覆行动的计划可以接受，但装备秘密军队的长远计划只有在战时内阁考察其可行性后方可提供一部分装备^⑨。这些表明，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政策的重点从注重考虑欧洲抵抗运动的长远战略意义转向偏重其短期作用。其次，苏德战争爆发使外交大臣艾登直接插手对敌占区的地下宣传。他联合新闻大臣向战时内阁施加压力，迫使其在 7 月成立一个新的组织——政治宣传署（PWE）控制对欧洲地下宣传。PWE 名义上由外交大臣、新闻大臣和战争经济大臣联合控制，实际上由艾登一手操纵。8 月，战时内阁正式

宣布废除 SOE 的相应机构。这一决定反映了对欧洲抵抗运动政策相对独立性削弱了,政府政治上的直接控制加强。第三,苏德战争促使英国加紧扶植流亡政府,以此抑制共产党力量,这又突出反映在英国对当时已出现全民抵抗势头的法国和南斯拉夫抵抗运动方面。如 10 月份,丘吉尔一改先前对戴高乐及自由法国不甚信任的态度,表示将“支持戴高乐倾其全力去建立一个全国性组织,以便联合抵抗共同敌人和最后从占领者手中夺取胜利”^③。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国政府加紧支持效忠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米哈伊洛维奇。9 月 20 日,SOE 派代表进驻米氏司令部,10 月中旬为其提供了 20000 英镑的援助,并苦心孤诣,将其吹捧为南抵抗运动领袖、盟国世界抵抗纳粹的楷模^④。

1941 年 12 月,美国的正式参战及其后的形势发展成为加速英国政策演变的又一重要因素。美国作为一个实力雄厚的工业大国参战,它所具备的巨大战争潜力及其参战后将派大军直接投入欧洲战场,使反法西斯战争具备了完全不同的战略基础。另外,1941 年底—1942 年初,苏军前线的崩溃之势基本被控制住,局部战线还出现转机。形势发展表明:不仅盟军未来反攻部队可望与德意军队旗鼓相当,而且不必依靠抵抗力量就能取得胜利,亦即随着美国的全民动员和强大苏军力量的恢复,盟军从战略上将不再依赖“第四军”^⑤。这样,欧洲地下军队的起义将不再充当反攻的主体而只有辅助作用,意味着自苏军参战以来已发生动摇的大规模武装秘密军队作为未来反攻主体的长远计划进一步失去存在价值,因而事实上被搁置。

同时,SOE 在实践中面临的种种难题也加速了英国政策的演变。在苏美参战导致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时,SOE 实际上成了各种矛盾冲突的焦点。如各国流亡政府急欲跨越 SOE 直接控制本国抵抗运动;英国外交部出于政治考虑以各种理由干预 SOE 的行动计划并想进一步控制其具体行动;参谋长们不愿牺牲正规军的利益而为 SOE 提供急需的各种物资手段,并要求 SOE 绝对服从其指挥,不得擅自行动,等等。这些因素使得战时内阁在 1942 年 2 月对其进行重大改组,由一位保守党人塞尔伯思接替道尔顿主管 SOE 工作,并规定 SOE 只能介入纯粹军事事务,其行动总体上由参谋长们把关,当贯彻军事事务引起复杂的政治问题时,由外交部仲裁^⑥。战时内阁对 SOE 的人事变动和政策调整,标志着 SOE 一个重要时期的结束。从此之后,它不再是一个能够独立从事反法西斯斗争、拥有系统的政策理论与行动计划的特殊机构,而只是一个具体行动的执行者。

总体上讲,从苏德战争爆发直至盟军北非登陆前夕,由于盟军没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英国政策本身趋于保守,SOE 的活动在大部分国家并不引人注目。不过,由于扶植抵抗运动依然是英国藉以消耗敌军的有效手段,而且因战争形势的缓解,英国战时机构得以采取一些实际措施支持欧洲抵抗运动。同前一时期相比,SOE 的活动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它与其他部门的关系也因道尔顿的离去及一些有关规定和条约而逐步趋于明确和一定程度的协调,因而在客观上取得了一些实施。如这一时期,它与流亡政府控制下的欧洲抵抗组织建立了长期联系。通过派驻代表、发布行动指示、空投援助物资、协助其培训谍报人员、建立健全地下组织网等,提高了欧洲抵抗运动的积极性和战斗力。它还依靠欧洲抵抗运动的一些非常成功的行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 1942 年 11 月 1 个空投到希腊的 SOE 行动团与当地游击队合作,炸毁了德军重要的供应线——戈尔波莫斯高架桥,有效配合了盟军的阿拉曼战役和北非登陆。这次行动对盟军领袖来说,它第一次显示了借助盟国官员的帮助、依靠占领区人民实施重大战术行动配合盟国战略计划的巨大潜力”^⑦,促使盟国再次正视抵抗运动的作用。

三

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决定推迟开辟第二战场而首先实施西西里登陆计划。这一战略决策使巴尔干抵抗运动战略地位迅速突出。根据卡萨布兰卡会议精神，参谋长给SOE的3月指示明确要求：“1943年春夏在巴尔干实施强大的破坏战和游击战的战略意义至关重要。它不仅可以阻止德国在东线的集结和加强，减轻苏德战场的压力，还可以阻止德军的石油、铬和铜的供应。在打败意大利之后，它们还将与盟军战略配合”^②。巴尔干抵抗运动所具有的全新战略意义，加之英国在该地区所追求的政治利益与该地区复杂的抵抗形势，使得英国对巴尔干抵抗运动政策成为西西里登陆前后英国政策的重心所在，而其中对南斯拉夫和希腊抵抗运动政策最具典型性。

南斯拉夫和希腊同属巴尔干地区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在盟军西西里登陆前夕，两国抵抗运动都已发展到相当规模。但两国内部均存在共产党领导的抵抗力量与以流亡政府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势力之间的尖锐冲突。出于配合西西里登陆的战略考虑，英国积极支持南、希两国开展全民武装抵抗。如在南斯拉夫，英国改变了先前只支持米哈伊洛维奇的做法，从5月份开始同铁托游击队接触并给其大规模物资援助。在希腊，尽管英国首相和外交部对希共力量一直持敌视态度，但SOE却遵循盟军中东司令部指令，促成希共的人民解放军与泽尔瓦斯的民族民主军联合作战。6月底7月初，它还主要依靠希共力量，成功实施了代号为“野兽行动”的大规模破坏行动。但随着西西里登陆的完成及抵抗运动内部的冲突激化而公开摊牌时，英国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在南斯拉夫，英国政府几经犹豫，最终决定在1943年11月以后放弃米哈伊洛维奇，全力支持铁托。而在希腊则断然要求SOE中止与希共的一切联系，并对SOE中东司令部实施改组，撤换了对希共表示同情的官员和最终驻兵希腊。

英国政府对南、希两国抵抗运动的不同政策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在英国战略中所占的不同份量决定的。相对而言，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战略地位更为突出，即便西西里登陆后其战略地位也并未下降^③。英国对南政策仍是战略考虑优先，况且铁托的游击队不论规模、战斗力还是纪律方面都明显优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显示出它们不仅会赢得反德战争的胜利，而且不必借助外援就能取得政权^④，因而明智的做法就是给铁托游击队尽可能的支持”^⑤，以利日后英南关系的发展。而战时希腊抵抗运动不仅不如南斯拉夫那么重要，而且同英国在希腊的长远政治利益相比也无足轻重，因为一个反英的希腊将直接威胁到日后英国在东地中海的利益。而希共力量远不如铁托强大，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也未取得绝对优势，更未强大到足以摆脱英国的控制。另外，当时的英苏协议也是影响英国政策的重要因素。正如艾登所言：“在希腊，苏联将支持英国的政策，而在南斯拉夫，我们则需要与米哈伊洛维奇断绝往来。”^⑥由此可见，尽管英国对南、希政策明显不同，但实质一样，即力图最大限度地保证英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和影响。

盟军西西里登陆揭开了意大利北部这个德军前沿地区抵抗运动高涨的序幕，也吸引了英国对该地区的极大注意。9月，当该地区爆发大规模游击运动时，SOE不失时机开始给抵抗团体提供大量人员与物资装备，但当游击运动进一步发展到有组织的武装抵抗、国内抵抗力量要求废除为英国承认和支持的意大利国王和君主政体时，英国又极力在压制抵抗运动的发展，并一意孤行，继续支持国王和君主政体，为意大利日后的政治纷争留下了隐患。

与英国在巴尔干和意大利半岛支持大规模游击战和破坏战不相称的是,在欧洲其他地区,英国政策相当保守。如在西欧、西北欧和北欧,英国除继续鼓励搜集情报、从事特定的破坏斗争和颠覆宣传,为下一年盟军登陆作准备外^⑤,并未增加任何新内容。这种消极待机战略加上盟军在这些地区没有重大战略行动,严重挫伤了抵抗运动的士气。一些抵抗力量内部组织松懈、遭受敌人破坏和渗透的现象非常严重。在中欧和东欧地区,英国则要求抵抗组织对德军经济、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破坏以减轻苏德战场的压力,但对该地区抵抗运动援助却日益减少。

1943年底,苏美英三国首脑的德黑兰会议决定于1944年5月1日正式实施开辟第二战场的“霸王计划”。作为该计划的补充,也原则上达成另一伪装计划——“保镖计划。”该计划包括两部分:一是意在把敌军注意力引向加来地区的“孚提留德行动”,法国的西北部和低地国家的抵抗组织将通过在这些地区不断增强的破坏斗争引诱敌人;二是“遮普林行动”,即旨在通过不断暗示英美盟军将在巴尔干登陆和通过颠覆、轰炸不断刺激巴尔干抵抗运动双管齐下,将德军注意力牵制在巴尔干地区并造成其视线混乱^⑥。很显然,为配合“霸王计划”和实施“保镖行动”,欧洲抵抗运动、尤其是西欧抵抗运动将起重要作用。

为确保SOE在这关键时刻发挥效力,英国战时机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1944年1月以后,SOE处理西北欧事务的各分部统一为一个联合司令部,直接听命于盟军最高司令部。英国有关当局还对SOE的内部组织和管理系统进行了整顿,清除了其中的纳粹特务及苏联的影响。与此同时,英国军事领导人最终同意在SOE的飞机总数已增至58架的基础上,每月再增加60架,另外还拨出50架用于SOE和OSS(美国战略勤务署)的联合行动^⑦。这一决定基本上解决了SOE至关重要的飞机供应问题。

盟军将在法国登陆,法国抵抗运动军事价值骤增。此时的英国政府进一步调整了抵抗运动政策。一方面,艾登和外交部致力于改善一度恶化的与戴高乐的关系,并试图说明罗斯福改变对法国的态度,以便让法国抵抗运动统一于戴高乐的旗帜下;另一方面着重加强对法国抵抗运动的援助并使之达到顶峰,如1943年盟军共动用626架次飞机给法国抵抗运动输送了568吨援助物资,而1944年1月至6月,动用飞机上升到2728架次、援助物资达3627吨,在登陆至解放这一阶段,动用飞机高达4030架次,援助物资增至6248吨,其中仅在6月25日、7月1日、8月1日和9月9日集中空投的物资分别为2077、3780、2281和810吨^⑧。此外,登陆前夕,由SOE、OSS和欧洲抵抗运动代表组成了许多“三人团”来协助抵抗力量与盟国关系。据统计,1944年6月到7月间,共有93个“三人团”进入法国^⑨。

但是,由于自苏美参战以来欧洲抵抗运动在盟军反攻中的战略作用已大为下降,即便在大反攻期间,欧洲抵抗运动也只被视为辅助力量,英国对抵抗运动的发动和支持也仅限于盟军反攻的中心地带,而且优先考虑与正规军的配合。至于西欧一些小国,如荷兰、比利时、挪威、丹麦等国,英国不主张这些国家进行公开抵抗,SOE的任务就是与这些国家流亡政府合作控制局势^⑩。

诺曼底登陆标志着欧洲解放的开始。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希望按民主原则重建国家政权,欧洲革命形势的发展令英国政府惶恐不安。为挽回影响,英国政府一方面忙于帮助在伦敦的各国流亡政府恢复政权,在欧洲解放区扶植亲英势力,填补法西斯崩溃后的政治真空,同时发布各种待命指示,防止抵抗力量建立政权,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解除抵抗力量的武器;另一方面,忙于同苏联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按英国外交部拟定的计划,它准备巩固在法国、低

地国家、斯堪的纳维亚、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希腊，最后是意大利的阵地，承认和尊重苏联在中欧、东欧、东南欧的利益，也不准备对苏联在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的优势地位提出挑战^⑨。在此基础上，英国同苏联达成协议，对划归苏联的地区，英国停止了对抵抗运动的一切援助。在英国势力范围内，它则公开镇压人民民主和革命力量。如1944年11月，丘吉尔公开干涉意大利政府任命斯福扎为外长；29日出兵镇压比利时反政府游行；12月6日，英军在雅典与希腊抵抗团体发生战斗并开始了对希腊人民的血腥镇压。由此可见，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所追求的短期战略需要逐渐被长远政治利益取代，英国抵抗政策不仅渐失其积极内容而且趋于全面反动。德国投降后，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政策的短期战略需要完全消失，作为反法西斯这一特定含义的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政策就此终结，出于反法西斯战争需要而出现的SOE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根据1943年初至1945年德国投降这一时期英国对欧抵抗运动政策及其实施情况，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是英国政策取得的成果最大、斗争最尖锐、形式最复杂的时期。从盟军决定西西里登陆至欧洲第二战场开辟，英国政策与英美战略密切相关，不同时期对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不同战略需要决定了英国政策的偏重和具体内容的差异。与此同时，反法西斯短期战略需要与在特定国家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尖锐冲突并达到顶峰。斗争的结果，决定了英国政策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第二战场开辟至欧洲解放，英国反法西斯短期战略需要逐渐消失，英国政策渐失其积极内容并告终结。

注 释：

- ①③④ 分别见巴特勒：《大战略》第2卷，伦敦1957年版，第209、212—213、215页。
- ②⑪ 格怀尔：《大战略》第3卷，伦敦1964年版，第40、518页。
- ⑤ 克鲁克香克：《第四军，1939—1945年心理战》，牛津1981年版，第179—180页。
- ⑥ 富特：《SOE史略》，伦敦1984年版，第19—21页。
- ⑦⑧ 休·道尔顿：《命运攸关岁月的回忆》，伦敦1957年版，第368、367页。
- 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 分别见斯塔福德：《英国与欧洲抵抗运动》第32页，文件附录2和附录4，34、63、64、66、72、文件附录7、148、159页。
- ⑬ 麦凯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游击队员》，伦敦1957年版，第51页。
- ⑭⑮ 富特：《SOE在法国》，伦敦1960年版，第187、164—165页。
- ⑳ 克洛格：《战时英国对南、希抵抗运动政策》，伦敦1975年版，第9页。
- ㉒㉓㉔ 《1961年欧洲抵抗运动史国际会议概要》，牛津一派加蒙1964年版，第105、113页。
- ㉕ 伍德豪斯：《为希腊而战》，伦敦1976年版，第26页。
- ㉖ 约翰·埃曼：《大战略》第5卷，伦敦1956年版，第75页。
- ㉗ 详见伍德沃德：《战时英国对外政策》第3卷，第115—119页。
- ㉘ 凯夫—布朗：《假象的掩饰》，随处可见。
- ㉚㉛ 约·赫斯特鲁普：《欧洲抵抗运动全史》，伦敦1981年版，第315、314页。
- ㉜ T·夏普：《战时盟国与瓜分德国》，牛津1975年版，第31页。

（责任编辑 吴友法）